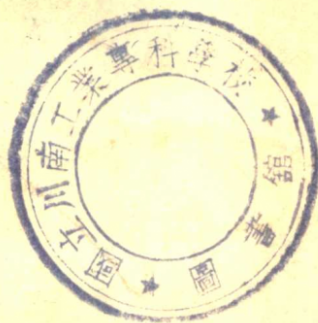


基本館藏

195567

思想建設 學習文件



1952 8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編

華南人民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書號：(穗)0265

思想建設學習文件

編輯者：中國共產黨中央
華南分局宣傳部

出版者：華南人民出版社
廣州大南路四十三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廣東分店
廣州永漢北路一七〇號

印刷者：萃經堂印刷所

60,001-76,000(穗3)

一九五二年五月初版

一九五二年七月三版

每冊定價2,000元

5515

4554

172

關於「三反」運動中思想建設的學習通知

爲了貫徹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鞏固「三反」運動的成果，在運動的最後階段（第四階段），必須認真進行一次系統的學習，在思想上劃清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界限，揭發與批判資產階級不勞而吃、損人利己、唯利是圖、假公濟私、投機取巧、鋪張浪費、享樂至上等腐化墮落思想，展開嚴肅的思想鬥爭，克服庸俗的自由主義，樹立以工人階級爲領導的思想和廉潔的、樸素的、爲人民服務的革命工作作風，才能在政治上思想水平上和工作上提高一步。特規定下列文件爲建設階段的學習內容，望各地各機關認真組織學習，並將學習情況和學習總結報告我們。

主要學習文件：

- （一）毛主席著：共產黨人發刊詞第五段（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七三至五七六頁）。
- （二）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章第四節第二段——資產階級（同上六〇九頁至六一一頁）。
- （三）周恩來副主席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的報告摘要。

(四) 陳伯達：紀念斯大林同志的偉大著作『中國革命問題』的二十五週年。

參考文件：

- (一)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四章——經濟政策。
- (二) 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
- (三)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關於批准開除左洪濤、楊奇黨籍的決定。
- (四)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開除左洪濤黨籍的決定。
- (五)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開除楊奇黨籍的決定。
- (六) 馮定：關於掌握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並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進行鬥爭的問題。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

目 錄

周恩來副主席在人民政協

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的報告（摘要）……………（一）

紀念斯大林同志的偉大著作

『中國革命問題』的二十五週年……………陳伯達（五）

關於掌握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並和

中國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進行鬥爭的問題……………馮定（一六）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命令……………（四四）

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關於處理貪污、浪費

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四四）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關於批准開除左洪濤、楊奇黨籍的決定……………	(三)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開除左洪濤黨籍的決定……………	(四)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開除楊奇黨籍的決定……………	(五)

周恩來副主席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

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的報告摘要

編者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於一月五日晚舉行第三十四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陳叔通、常務委員李維漢、王崑崙、蔣光鼐、章伯鈞、黃炎培、章乃器、馬叙倫、張奚若、烏蘭夫、馮文彬、梁希、邵力子，列席會議的有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籌備處委員葉季壯、南漢宸、項叔翔、溫少鶴，以及全國委員會委員胡喬木、陳其瑗等。

會議在聽取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籌備處陳叔通主任所作的關於籌備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各事項的報告後，批准了「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代表會議組織條例」、「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代表會議地區代表產生辦法」，並決定於三月十五日召開該項會議。

會議繼在聽取胡喬木委員所作的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的報告後，通過了「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和「全國委員會學習委員會的組織辦法」，並即決定發出通知，號召全國社會人士，特別是工商界人士參加目前政府機關、企

業、學校、團體、軍隊和黨的機關所進行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

在討論上項議程中，周恩來副主席報告了正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展開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鬥爭和思想改造運動的情況，並號召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是工商界人士積極參加這一運動，進行自我改造。摘要如下：

周副主席首先指出：目前，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正在各級政府機關、企業、學校、團體、軍隊、黨派中緊張地進行，並需要繼續深入。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毒害，在中國的階級社會中，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是有着深厚的社會基礎的。要完全地、徹底地剷除這一積害，必須全社會都動員起來，特別是與貪污、浪費有密切關係的工商界要動員起來。

在談到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鬥爭與資產階級的關係時，周副主席說，今天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其積極進步的一面，那就是由於他們長期受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因此，他們中間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參加過或同情過人民解放鬥爭，解放後，他們逐漸參加了人民中國的建設，並在國家的領導下，發揮着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於他們與帝國主義的封建的、官僚買辦的經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同時，中國資產階級本身也同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一樣，具有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本質，因此，解放後，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檢舉的，常常以行賄、欺詐、暴利、偷漏等犯法行為，盜竊國家財產，危害人民利益，腐蝕國家工作人員，以遂其少數人的私利。這種情形如果不加以打擊和剷除，而任其發展下去，則我們革命黨派、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團體日益受着資產階級的侵蝕，其前途將不堪設想。

不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參加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也是我們國家五種經濟成份之一，但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在人民中國並不是可以不受限制而自由發展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是承認了這個政權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是要在國家經濟領導之下的，因之他們在國家、社會和經濟生活中是有可為的方面，有不可為的方面，有被容許發展的方面，亦有被禁止發展的方面。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經濟事業，就容許發展，凡不利或有害於國計民生的私人經濟事業，就不容許發展，凡能操縱國計民生的經濟事業，就應由國家統一經營，這是共同綱領規定了的。祇有這樣，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才能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否則，私人經濟事業如果不受限制、不受領導而任其自由發展，則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將不是新民主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將不是走向社會主義而是回復到帝國主義的附屬國或殖民地的經濟。非如此，即如彼，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

周恩來副主席繼就中國私人經濟事業應受領導和限制問題作了詳細分析。周副主席說，在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第一、不能孤立地講公私兼顧，而一定要在服從國家經濟領導的條件下講公私兼顧，就是說要在符合全國大多數人民的最高的和長遠的利益的原則下照顧私人利益。第二、不能抽象地講勞資兩利，而一定要在承認工人階級領導的前提下講勞資兩利，以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產，而一定要逐步實現國家生產總計劃的領導。無論公與私，城與鄉，中央與地方，大公與小公，都必須逐步納入計劃。否則，工農業的盲目生產，就會發生過剩與不足，商業的盲目經營，就會擾亂市場，波動物價。第四、不容許謀取暴利，而祇

能在國家規定的幅度或議定的價格內取得合法利潤。第五、不能容許行賄、欺詐、偷漏、盜竊、引誘等犯法行為繼續發生，聽其侵蝕人民政權，損害國家財產，腐蝕國家工作人員。凡有犯者必須懲辦，坦白自首者則從寬處理。人民政府所保護和歡迎的是那些擁護共同綱領、服從政府法令的工商業家，而不是那些不受領導和限制而想自由發展、盲目生產、貪圖暴利的工商業家。中國的工商業家如果按共同綱領的方向發展，遵守國家政策法令，服從國營經濟和國家生產計劃的領導，那麼，他們的出路是光明的；他們不但在目前時期可以充分地發展他們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業，而且在將來全國轉入社會主義的時期，也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機會，並且可以保留他們的消費財產。相反的，如果有人違背共同綱領和國家政策法令，抵抗國營經濟和國家生產計劃的領導，那是與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背道而馳，必將遭受全國大多數人民的反對而歸於失敗無疑。正因為祇有工人階級才能擔任領導而資產階級決不能擔任領導，所以在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其領導思想，祇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祇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而資產階級思想却不能不受批判和改造。

周副主席在結束講話時說：中國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今天通過「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並決定首先號召全國社會人士特別是工商界人士參加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是有歷史意義的。我們號召全國工商界人士參加這一鬥爭，進行檢舉和坦白運動，這不僅在鞏固人民民主政權和樹立新的社會風氣上將有所貢獻，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將有所收穫，並利於與全國大多數人民一道前進。

【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人民日報」】

紀念斯大林同志的偉大著作

『中國革命問題』的二十五週年

陳伯達

斯大林同志的偉大著作『中國革命問題』，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當時的情況，一方面是中國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強大高漲，另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在上海襲擊革命並在南京實行屠殺，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則公開投降帝國主義，叛變革命。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蔣介石底政變是表示民族資產階級之退出革命。』革命的力量和反革命的力量形成了新的調動，新的分野，新的結合。中國革命正處在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這個變化的新形勢，向中國共產黨，向中國無產階級，向中國人民，進一步地提出了中國革命向何處去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在他這個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偉大著作中，根據他對於中國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革命性質的分析，概括了中國革命的經驗，指出了中國有兩條發展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說：

『中國事變底發展有兩條道路：

或者民族資產階級擊破無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勾結，共同進攻革命，以便建立資本主義的統

治來結束革命。

或者無產階級把民族資產階級擠在一邊，鞏固自己的領導權，率領城鄉千百萬羣衆以克服民族資產階級底反抗，取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完全勝利，然後把它逐漸轉移到社會主義革命底軌道上，伴有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

二者必取其一。」

這是斯大林同志的極端英明的指示。

根據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就是說，如果民族資產階級打敗無產階級，那末，就會使中國革命陷於失敗，使中國繼續處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繼續成爲帝國主義的附屬品。這是一條道路。反之，如果中國無產階級能够繼續鞏固自己的領導權，克服民族資產階級的反抗，那末，中國便將獲得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完全勝利，而逐步過渡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這又是一條道路。

就是說，兩條道路：一條是中國革命失敗的道路，一條是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

是否還有什麼『第三條道路』呢？斯大林同志說：『二者必取其一。』其他什麼『第三條道路』是並沒有的。

斯大林同志說：『這兩條革命道路之間的鬥爭，乃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二十五年來中國一切歷史事變的發展，完全證明了斯大林同志這個天才的結論。

決定兩條道路的問題，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明了的，乃是關於領導權或是屬於資產階級或是屬於無產階級的問題。從中國無產階級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時候起，這個關於領導權的鬥爭，已經有了三十來年的歷史。從一九二四年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成立革命的統一戰線到一九二七

年蔣介石叛變的這一個時期，便是一方面是革命的聯合和另一方面是關於領導權的鬥爭——這兩個方面互相交錯的歷史。斯大林同志指出：『在這個時候，民族資產階級（不是買辦資產階級）是與革命一道前進的。這是全民族聯合戰線底革命。這並不是說，革命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不會有過矛盾。這只是說，民族資產階級在支持革命時，竭力爲了自己的目的來利用革命，使革命主要循着奪取地盤的路線進行，並且限制革命底規模。』

可是，在這個關於領導權的鬥爭中，民族資產階級有了最致命的弱點。這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上的軟弱，它對於帝國主義的依賴，它對革命運動規模的畏懼。』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取得城鄉勞動羣衆的援助，它害怕農民革命並反對農民革命，這樣就造成了它在國內的孤立的地位。無產階級却相反，這也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無產階級底日益增長的革命積極性，它在千百萬勞動羣衆中間的威信之增長。』民族資產階級之致命的弱點，恰恰就是無產階級獲得和鞏固領導權的決定性的優點。它是農民革命的領袖，而且也只有它才能够領導農民的解放。

民族資產階級之致命的弱點，不只是在國內條件上，而且是在國際的條件上。中國的革命正是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是處在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系統已是百孔千瘡，搖搖欲墜。中國資產階級是不可能從那裏找到一個靠得住的靠山的。但中國無產階級却相反：自從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世界已經出現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世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正如太陽方升。中國無產階級的朋友遍於全世界，首先蘇聯是中國人民最可靠而強有力的朋友。這種國際的條件，對於中國革命的鬥爭來說，是完全有利於無產階級

的。

斯大林同志明顯地指出：「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及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底存在——這一專政底經驗，中國無產階級可以順利地利用——大大地便利於中國革命第二條道路實現的可能性。」事實就是如此。

斯大林同志當時一方面反對了叛徒托洛茨基派企圖跳越過中國革命所正處的階段及其所提出的獻媚於中國革命的敵人的種種主張，一方面反對了叛徒陳獨秀派遷就資產階級的懦弱無能的種種政策。這些叛徒們當時表現的形式雖然不是一樣的，但他們的活動都是在於破壞中國革命，把中國革命引到失敗，以適合於帝國主義者、中國封建勢力和一切中國革命敵人的目的，而隨後這些叛徒也就很快地在這個目的上完全結合而為一體了。斯大林同志駁斥了這些叛徒們的胡說，而認為必須竭力鞏固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率領廣大的城鄉勞動羣衆，利用國際有利的條件，把中國革命推向第二條道路上前進。就是說：「共產黨員的基本任務是在於為中國革命第二條道路而鬥爭。」

斯大林同志說：「數萬萬勞動羣衆的積極性之增長乃是革命勝利的主要保障，而工農的武裝，乃是反對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劑。」但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這些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同志堅持共產黨在革命統一戰線中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照斯大林同志的話說來，「這是保障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所必要的條件」。

但是，中國革命是在極為曲折的道路上前進的。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中國革命在走向勝利的道路上比起俄國革命要遇到更多得多的困難，在這一革命進程中的投敵和叛變比起蘇聯內

戰時期將更多得無比。」在蔣介石叛變以後，罪惡的陳獨秀機會主義者，拒絕斯大林同志的指示，繼續否認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敢放手地發動羣衆和武裝工農，他們在農民革命和武裝工農面前完全表現出叛變的行爲，結果就促進了武漢政府的叛變，而使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遭受到失敗。

雖然如此，我們黨却根據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革命路線，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不顧資產階級的叛變，獨立地開闢了廣闊的土地革命的道路，把革命推進了新的階段。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革命從城市退却到農村，而又把這種革命的正確的退却和正確的進攻結合起來，使這種退却轉而變成了新的進攻。

完全如斯大林同志的估計：「這種土地革命將加強和擴大反帝國主義、反土豪劣紳和封建地主、反軍閥及蔣介石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斯大林同志寫道：「蔣介石底政變表明着：從此以後在華南將有兩個營壘、兩個政府、兩個軍隊、兩個中心：武漢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由於陳獨秀的妥協政策和汪精衛的叛變，武漢這個革命中心沒有繼續保持下來，但是斯大林同志的預見完全是正確的。在汪精衛繼蔣介石而叛變以後，革命的中心由武漢轉移到農村革命的根據地。於是，在整個中國便造成了這樣一個形勢：一方面是以蔣介石爲首的反革命營壘、反革命政府、反革命軍隊、反革命中心，但另一方面，則是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革命營壘、革命政府、革命軍隊、革命中心。這個革命營壘、這個革命中心，雖然開始在地區上的面積還不算很大，但是因爲它是建立在廣大的工農羣衆的基礎上的，所以它的力量乃是無限的，它是必然要逐步擴大，成爲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奪取

全國政權的出發點。而相反，蔣介石這個反革命營壘，這個反革命中心，雖然一時是很猖獗的，這個反革命統治雖然一時佔有很大的面積，但是，因為它在人民中是孤立的，所以在長期進行反革命的戰爭當中，它的力量就必然要逐步削弱，它是一定要滅亡的。

蔣介石集團在其反革命的過程中，殘酷地掠奪人民，堆積了龐大的財富，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團，即買辦的、封建的、軍事的官僚資本集團。這個官僚資本集團的主要後台老闆是美英帝國主義者，但這個集團同時也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奴才。這是表示蔣介石在人民中更加陷於孤立的地位。

在中國人民偉大的覺醒的力量壓迫之下，同時也由於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的爭霸，蔣介石於一九三七年無可奈何地和不得已地參加了抗日戰爭。依靠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和努力，中國在這時候重新出現了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民族統一戰線。但是在參加抗日的資產階級當中，已經很顯然地分為兩個有差別的集團：一個即是以蔣介石為首的、當權的、美英帝國主義工具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團，一個乃是不當權的民族資產階級集團。

顯然，中國共產黨這個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正如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所建立的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一樣。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駁斥叛徒托洛茨基派胡說的時候，曾經這樣指出：『中國與一九〇五年的俄國不同，是一個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國家；因此中國革命不單純是資產階級革命，而且是反帝國主義類型的資產階級革命；帝國主義在中國把持着工業、商業和交通底命脈；帝國主義底壓迫不僅觸到中國勞動羣衆，而且也觸到中國資產階級某些階層；